

全视角看美国丛书



谁是无赖国家

ROGUE STATE

[美]威廉·布鲁姆 著 罗会均 等译 光明 校

William Blum

这是一本颠覆性的书
它摧毁了那些基于谎言
把美国说成是世界霸主的说法

新华出版社

谁是无赖国家

〔美〕威廉·布鲁姆 著

罗会均 向宇 冯悦 译 光明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无赖国家/ (美) 布鲁姆著; 罗会均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10

ISBN 7-5011-5914-9

I. 谁… II. ①布…②罗… III. ①霸权主义—研究—美国②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D7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926 号

京权图字: 01—2002—5037

Rogue State

Copyright © William Blum, 2001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谁是无赖国家

[美] 威廉·布鲁姆 著

罗会均等译 光明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50千字

2002年10月第一版 200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914-9/D·940 定价: 25.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 65895562 65897685

本书作者

威廉·布鲁姆，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1967年因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而离职。后成为华盛顿第一家“地下”报纸《华盛顿自由报》的创始人。1969年，他写了一本揭露中央情报局的书并出版，200多位中情局雇员的姓名和地址在其中被披露。他曾在美国、欧洲和南美从事自由新闻职业。70年代中期，他与中情局前官员菲利普·阿吉及其伙伴们一起在伦敦继续揭发中情局的劣迹。80年代后期，作者住在洛杉矶，以剧本写作为主。目前住在华盛顿特区。

责任编辑：李树林

贾晓伟

封面设计：王小明

傅小宁

策 划：天禄琳琅

《全视角看美国丛书》总序

美国不仅是美国人的梦，许许多多不是美国人也一直在做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实现了和实现不了的美国梦，其中不仅是由于两百多年美国的进步与成就、富足与繁荣，也许还有民主与自由光环下的光荣与梦想，甚至可以带来喜悦与兴奋的冒险与刺激。

既然是梦想，即使是耀眼的光亮下，少了些对黑暗与问题的审视，并不足为怪，不知者亦无罪。若视而不见，则有些可怕，不仅可怜。

我们也不是要危言耸听，更非片面攻击。美国确实就是美国，美国的先进、发达、开放与富足，非以遮掩可以取消，然而明总是与暗伴生的。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美国？美国人自己是如何看美国的？

美国还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

美国真那么民主得可口无遮拦吗？

美国 CIA、FBI、五角大楼、白宫，还有媒体在干什么？有哪些是你知道的，还有哪些你不知道？

美国怎么可以独往独来，擅行单边主义，甚至可以

挟 UN 以令诸国？

美国对别国的主权和人民生活的干涉究竟有多少？
它怎么会想打谁就打谁？

美国当权者究竟把什么样的人当朋友？

美国企业的账都怎么了？瞒报坏账的只是安然和世界通信吗？

我们并非要诸位的美国梦断，只是梦可醒就好，看到的比单一的梦境多一些视角和事情。此即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和主旨。

闲了，让我们认认真真地来看看这，啊——美丽家，AMERICA！

编 者

2002 年 10 月

导 言

本书也可称做《连环杀婴狂及其爱人系列》。

女人真的不相信她们所心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哪怕那些婴儿缺胳膊少腿或是身首异处。假如她们相信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她们也深知她们所爱的男孩一定怀有最善良的动机；那肯定是某种非常不幸的意外，也就是善意的过失；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这样做是人道主义的行为。

在长达 70 年的时间里，美国使全世界不少人相信存在着一个国际阴谋集团——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集团，它寻求控制整个世界，而其意图并不具有任何社会价值。世界被假想成无论如何需要美国将它从共产主义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购买我们的武器吧，”华盛顿说，“让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企业无拘无束地穿越你们的国土，并把你们对自己未来的领导人的否决权交给我们吧，我们会保护你们的。”

自从男人让女人们相信她们需要男人保护以来，这是最为精明的保护骗局——假如世间所有的男人都在一夜之间消失，那么将有多少女人不敢在街上漫步？

又假如某外国领土上的人民愚昧至极而没有认识到他们需要拯救，假如他们无法领会美国人动机中那隐而不显的高尚，他们就会受到警告说，他们将在共产主义的地狱中烧为灰烬。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十年，美国仍在保护各国与各民族免遭这

样或那样的危险。在这方面美国的纪录如下：从 1945 年到 20 世纪末，美国试图推翻 40 个以上的外国政府，镇压 30 个以上与不堪忍受的政权展开斗争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在此期间，美国造成数百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迫使更多的人陷入痛苦和绝望的境地。

当我于 1999 年 4 月在华盛顿特区写作此书的时候，美国正忙于“拯救”南斯拉夫。它在把一个现代而又成熟的社会轰炸到前工业时代，而“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凭着它无限的智慧，确信它的政府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外国的高官显贵们云集华盛顿，他们在这里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 50 周年，为期 3 天的庆祝活动场面空前热闹、壮观。各国首相、总统与外交部长们，不论他们的职位等级如何，都乐意加入到亲朋好友的队伍中来。各私人企业正纷纷给这个奢华的周末提供资金，其中有 12 个企业各支付了 25 万美元，目的是使它们的一位董事成为这次北约首脑会议筹委会主任。许多同样的企业也极力游说，要求通过接纳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来扩大北约，这三个国家都将从这些企业购买大量的军事装备。

北约内部的密切合作与超国家化是“世界新秩序”的基础，世界新秩序是乔治·布什给美利坚帝国的名称。世界新秩序的可信度取决于全世界相信新的世界将是一个对人类的大多数、而不只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而言更加美好的世界，并认为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即美国对其他各国心怀善意。

我们不妨粗略地考察一下美国现代史中某些片段，这或许具有启发性。1994 年的一份国会报告告诉我们：

在 40 年代大约有 6 万军事人员作为人体实验对象被用来试验两种化学制剂——芥子气和易式毒气 [水疱毒气]。被当作实验对象的这些人大多数未被告知实验的性质，在他们参与这项研究后也从未接受后续治疗。

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受到这样的威胁：如果他们对其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妻子、父母和家庭医生谈论这些实验，他们就会被囚禁在莱文沃斯堡。数十年来，五角大楼矢口否认进行过这项研究，导致许多老兵忍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病痛折磨，在这项秘密的实验之后他们成了羸弱的病人。^①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90 年代的情况吧。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从海湾战争归来后得了一种罕见而又使人精力不济的精神不安症，这被怀疑是由于他们暴露于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或生物制剂之中的缘故，但五角大楼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几年来这些美国士兵遭受了可怕的折磨：诸如神经系统上的各种病症、经常性的疲劳、皮肤病症、肺部留下的创伤、记忆丧失、肌肉与关节疼痛、剧烈的头痛、人格变异、失去知觉以及更为严重的其他症状。五角大楼终于一步步地被迫放弃它原来的种种否认，并承认当时发生过化学武器库爆炸事件，接着可能释放出各种致命的毒气，当时美国 400 名军人确实就在这些有毒释放物的附近；然后国防部承认可能有 5000 人；之后又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大约超过 15000 人；最后给出了一个精确的数字——20867 人；但这还不是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五角大楼宣布，一个期待已久的计算机模型估算差不多有 10 万美国士兵可能曾暴露在大量的沙林毒气之中……”^②

士兵们还被强迫接种抗炭疽疫苗和没有经过食品与医药管理局认可为安全有效的神经气。假如他们抗拒命令，就要遭到惩罚，有时受到罪犯般的虐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士兵被迫接种一种黄热病疫苗，结果他们中间大约有 33 万人染上了病毒性乙型肝炎。^③）终于在 1999 年下半年，也就是在海湾战争结束差不多 9 年之后，美国国防部宣布：海湾战争中发放给士兵使他们免遭特别神经毒气侵害的一种药物“不能被排除”是导

致一些退伍军人出现慢性疾病的原因。^④

更有甚者，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们并没有警告美国士兵，他们正处在可怕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在战场上紧挨着那些已经用过的贫铀武器。

假如五角大楼从一开始就对其掌握的所有有关这些不同类型的物质和武器的情况采取更为坦率的态度，士兵们也许在早期就得到了确诊，并很快接受适当的治疗。从人类痛苦的角度来衡量，其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估算这种代价的一种方法是：在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中大约有一分之三是退伍军人。

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数十年间，我们究竟发现了什么？这就是把士兵当作试验品的五花八门的——或者是形式上、或者是实际上的——政府计划：诸如派飞行员穿过蘑菇云，进入核爆炸场所；接受各种生化武器实验、核辐射实验以及用麦角酸二乙酰胺洗脑的行为调节实验；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士兵的身体暴露在橙桔制剂（一种化学武器）中；……这一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事实上，数以万计的被试验者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没有机会获知充分的情报，实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他们很少受到适当的医治，甚至连身体检查也很少进行。^⑤

这一小段零星的历史在道义上的教训很简单：如果美国政府对它自己士兵的健康与生活福利漠不关心，如果我们的领导人面对这些可怜的战士——他们应征入伍，从事帝国的战争——长期的苦痛与不幸无动于衷，那又怎么能说，或者怎么能相信他们会关心别国的人民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1955 年当中情局的一位官员问达赖喇嘛：“我们在（给西藏人）提供支持方面到底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做了件坏事？”这位西藏的精神领袖回答说，虽然美国助长了反抗中国的那些人的士气，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反抗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而且

“美国政府之所以卷入西藏的事务，并不是要帮助西藏，而只是把它作为向中国人挑战的一种冷战策略而已”。^⑥

“让我向你们说说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吧，”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写道，“他们与我，还有你们可志不同、道不合啊。”

我们的领导人也就是这种人。

就拿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来说吧。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承认，关于美国只是在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后才给予阿富汗抵抗力量以军事援助的官方说法本身就是谎言。他说，尽管他认为“援助将导致苏联军队的入侵”，并将这想法告诉了卡特——事实的真相是，在俄国人采取行动之前六个月美国已开始援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反政府集团。

有人问布热津斯基是否对这一决定感到遗憾，他的回答是：

遗憾什么？那次悄悄行动就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它产生的后果是将俄国人拖进了阿富汗的陷阱，而你却要我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苏联军队正式跨过阿富汗边境的那一天，我给卡特总统写信说：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给苏联一次越南战争。确实，在几乎长达10年的时间里，莫斯科不得不进行一场政府难以维持的战争——一场导致军队士气低落并最终造成苏联帝国解体的冲突。^⑦

在阿富汗战争与苏联帝国的解体之间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除了这一事实之外，我们还面对那场战争的种种后果：一个承诺要把那个极为落后的民族带入20世纪的政府惨遭失败；一场令人震惊的血腥大屠杀；连美国政府官员也称是“难以形容的恐怖”的伊斯兰反政府武装的酷刑；有半数的人口或死亡，或残废，或成为难民；成千上万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出现，他们在许多国家制造了暴行；以及在阿富汗对妇女难以置信的压

迫，而这种压迫由美国战时的盟友加以制度化。

由于布热津斯基在造成上述所有这些后果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他当然不会有任何遗憾。什么遗憾？这位大人物为此而感到十足的自豪哩！关于这样一个人——就像一个反社会的人——你能说出他表现最为仁慈的事情就是：他是没有是非道德观念的。假如在中世纪，他就被称为“恐怖者兹比格纽”了。

而关于吉米·卡特——不少人认为他也许是自罗斯福以来占领白宫的唯一一位半吊子贤人了——这又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还能说他就是林肯吗？

1977年，当新闻记者们追问卡特，美国是否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重建越南，卡特总统回答说：“咳！破坏是相互性的。”^⑧（也许当在这年早些时候视察南布朗克斯区的废墟时，他的印象是：这起因于越南轰炸。）

在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与记者莱斯利·斯塔尔之间进行的那次著名的电视交谈中，后者谈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并问这位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们已经听说有50万儿童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数目比在广岛死去的儿童还要多。而您也清楚，是真的值得付出这种代价吗？”奥尔布赖特答道：“我认为这是极为艰难的选择，但就代价而言，我想，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⑨。谁都可以对奥尔布赖特的任何过错作完全善意的解释，还可以说她除了捍卫政府的政策之外别无选择。可是，一个接受某一职务任命，并且十分清楚本人将成为这一实际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被期望毫无歉疚地捍卫这些政策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此后不久，奥尔布赖特被任命为国务卿。

劳伦斯·萨默斯是另一个恰当的例子。1991年12月，当时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他写了一份内部备忘录，说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把“污染性工业”移植到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去，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损害健康和甚至导致死亡的污染成本因此会低一

些。由于这些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受疾病侵害的工人失去的收入，在一个薪水极低的国家中所估算的成本还会低许多。“我认为，”他写道，“在一个薪水最低的国家倾泄一车有毒废物，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事实。”^⑩ 尽管这一备忘录广为散发，并受到普遍谴责，但萨默斯还是在 1999 年被克林顿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这是因为他处理国际事务得当才从财政部次长的位置得到提升的。

我们还有克林顿本人的例子。在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的第 33 天——这是摧毁村庄、学校、医院、公寓建筑和生态的 33 天，是使老百姓四肢不全、双目失明、肠子外溢，使儿童的精神受到永远的创伤……的 33 天，对塞尔维亚人而言是将其无法再体验到的生活方式实行摧毁的 33 个白天黑夜——克林顿告诫人们不要对轰炸政策作出不成熟的评判，他不失时机地宣布：“33 天的轰炸时间似乎显得比较长。（但）我认为这次空中打击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⑪ 然后老兄又继续了 45 天的轰炸。

克林顿的副总统阿尔·戈尔好像非常适合继克林顿之后荣登美国总统宝座。1998 年戈尔给南非施加强大压力，如果南非政府不取消那个使用更便宜但未经注册的治疗艾滋病药物的计划——这一计划将削减美国有关公司的销售额——美国威胁要对南非实行贸易制裁。^⑫ 应该注意的是，在南非的基本贫困人口中大约有 300 万患免疫缺乏病毒呈阳性（HIV - positive）的人。戈尔当时与药品工业有重要的联系，^⑬ 而当他在纽约演讲时有人问他就此具体做了些什么时，他不愿意作出实质性的答复，而是吊起嗓子喊道：“我喜欢这个国家。我喜欢第一修正案。”^⑭ 饶有趣味的是，当奥尔布赖特 1998 年 2 月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被人诘问时——当时她正在为克林顿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作辩护——她也提高嗓门大喊：“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尽管戈尔和奥尔布赖特的言辞并不完全具有“德国利益高于

一切”或“大不列颠日不落”之类的口气，但爱国主义确实是一个无赖最后的遁词。

1985年，罗纳德·里根显示出了他因此而受人尊敬的杰出才智，他宣称：“我不是什么语言学家，不过我听说在俄语里面连一个有关‘自由’的单词也找不到。”^⑮里根试图以此表明，苏联是如何的集权。根据对以上人物及其言论的简单回顾，我们是否可以设问，在美式英语里面有没有一个关于“尴尬”的单词？

不，这不是简单的权力腐败和非人性化问题。

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掌权者们冷酷无情，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就变得残酷了。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领导人之所以冷酷无情，只是因为，那些愿意就能做到心狠手辣的人居然可以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占据领导职位；这一点不妨写进工作记录，而那些能对远在天边手无寸铁的陌生人表以富有人性的同情与怜悯的人们——更不用说美国的士兵——却不能成为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或财政部长。再说，他们也没有这种欲望。

这里存在一种运行中的彼得原理。劳伦斯·彼得写道：在无论什么样的等级体系中，每一位职员总是倾向于爬上与其能力不相称的级别。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这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去推行帝国主义统治的对外政策执行机构中，职员们都拼命想去达到他们能够容忍的最残酷的程度。对南联盟的轰炸结束几天之后，《纽约时报》在“周末评论”栏目里作为题头文章刊登了迈克尔·万斯的一篇评论。文章声称：“人权已经升华为军事优势和西方价值优势……而战争只能加强一个致力于结束非人道又推行理想主义的‘新世界’与一个执迷于冲突的‘旧世界’之间深刻的意识形态分野……西方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之间在个人生活的价值上也有天壤之别。”如此等等。好一首西方人天生仁慈的赞歌！不幸的是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却没有分享到西方的这一精神风貌。万斯批评说，他们“就是没有引入西方的权利与责任观

念”。^⑩该报是在“西方国家”刚刚结束对一个主权国家有史以来最野蛮的连续轰炸之后，给我们灌输这一道德说教的。

在美国 1991 年轰炸伊拉克期间，一连串暴行记录之一——一个民用防空掩体被一颗贫铀弹摧毁，结果使几百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和儿童——被烧成灰烬，白宫发言人马琳·菲兹沃特一再提到美国军方的说法，即认为这个掩体是一个指挥与控制中心，他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市民要呆在那个地方，不过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并不与我们共有人的生命神圣这一价值观。”^⑪

同样，在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向我们保证说，亚洲人不像美国人那样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当然，我们是在美国的炸弹、凝固汽油、橙桔制剂和作战直升飞机把越南人民弄得妻离子散，将他们所珍视的生命弄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听到这一说教的。

而与此同时，即 1966 年 2 月的一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编辑戴维·劳伦斯在他人的怂恿之下把下面的一段话刊登在报纸上：“美国目前在越南的所作所为，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亲眼所见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行善的最有意义的例子。”

我给劳伦斯先生寄去了一份制作精美、题为《美国在越南的暴行》的小册子，里面对美国的暴行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我还附上了一个注释，注释首先重复了劳伦斯的一段话，下面是他的大名，接着我加上：“我们中间有一个是疯子”，后面是我的名字。劳伦斯给我回了满满一页的一封信，信的中心意思是：“我认为仔细读读它（小册子）就会证明我试图要确立的论点——即内心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必须得到帮助，以理解一种文明生活的真实基础。”

美国人的思想——迈克尔·万斯和戴维·劳伦斯的思想就是其中的典型——在政治上如此根深蒂固，要使它得到解放需要采用

不同寻常的甚至迄今仍未发现的哲学与外科手术式的技巧。大多数美国人，即使那些最为玩世不恭的人——他们大可不必去验证那些出自政客之口的词语，那是一堆由错误的信息、内容恰恰相反的信息和子虚乌有的信息组成的大杂烩，他们应该随时携带一份诚实健康警告——当他们面对“我们的冒着生命危险的孩子们”时，似乎丧失了他们的重要感觉功能。假如爱是盲目的，那么爱国主义也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五官感觉。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即这些美国人的玩世不恭，贯穿在本国政府习以为常的对外冒险政策中，这就应该去质问政府当局了：对某一局势规定的解释是否有效，规定的目标是否值得，规定的目标是否能取得成功，而不是去质问政府的动机了。有人先验地假定，在那些与美国打交道的外国人的眼中，我们的领导人对他们是怀有善意的——不管他们的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多大的伤亡、破坏与灾难。

国会议员奥蒂斯·皮克在 1975 年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发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若干秘密行动计划，虽然其中有一些仍未公开，但不少已泄漏给公众。在一次会谈中，他表示，任何国会议员都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报告，只要他答应不泄露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并没有很多人想去读它”。

“为什么？”采访者问他。

“哦，他们认为不知道为好，”皮克回答说，“在那份报告中太多的事情让美国人感到尴尬。你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水门事件’的可怕伤痛。但即使在那个时候，要求他们相信的只是：他们的总统一一直是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在新的形势下，要求他们相信的更多；他们被要求相信他们的国家一直很坏。但无人打算相信这个。”^⑨

这就好比由于你孩子的行为举止怪异，你去找夏令营管理